



《植物先生：二十四节气植物研学课》，袁明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

《植物先生II：二十四节气时食植物研学课》，袁明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

目中有人，笔下有情

□徐可

谈及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人们常引用孔子语录：“《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们以此强调“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重要价值。相传孔子删定后的《诗经》，记载草木188种、鸟兽虫鱼155种，以诗性笔触构筑了一个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然而，我们究竟该如何书写草木？书写自然的意义何在？尽管近年来自然文学创作日趋兴盛，但这一核心问题仍未得到清晰解答。《植物先生》系列图书是否给出了圆满答案？我不敢妄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套书在以下几方面作出了可贵探索与独特贡献。

首先，作者将24种植物与二十四节气一一对应，以植物为媒介，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二十四节气这一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总结时令、气候、物候变化规律形成的知识体系与社会实践，是先民在农业生产与气候观测中积淀的智慧结晶，已先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对二十四节气反而日渐疏离。作者精心遴选24种植物，让一种植物对应一个节气，使原本抽象的节气变得可视、可闻、可触，也让这些植物

被赋予了更鲜明的文化象征。在书写中，作者并未停留在植物知识的简单介绍，而是着力于诗意表达，融寄托、比兴于文字之中，让草木书写兼具知识性与文学性。

其次，作者在以植物书写节气时，融入了个人情感，使笔下的植物有了温度。与自然有关的文学作品，通病往往是“目中无人，见物不见人”。而《植物先生》系列图书的作者将自己放了进去，将自己的人生轨迹与生活阅历融入其中，从而建立起物与人之间的联系。无论是作者的童年记忆、浓郁的乡愁，还是对亲人的思念，都让笔下的植物有了感情的温度。读《植物先生》，我有个突出感觉：作者是一个深情之人。他的很多文章都饱含感情。比如，《小满：青春芳华合欢树》就是一篇饱含深情的作品。该文从合欢树写到电影《小花》的主题歌《绒花》，再写到张贤亮的《绿化树》、史铁生的《合欢树》，以及非洲草原上的金合欢树。我猜想，当他一一列举这些文学作品和现实中存在的合欢树时，心中一遍遍回响的，一定是《绒花》那催人泪下的旋律：“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

第三，每本书里都有24篇文章，每一篇都是精美的小品随笔。每篇仅一两千字，短小精悍，平易亲

切，语言朴素而干净，如话家常，读来轻松。作品的语言鲜活生动，比如：“阳光一出来，春气就絮絮绕绕弥漫开来。”“羞涩了一个冬天的青色花苞，那一条条卷曲的管状花蕾，突然从抱紧的小拳头中舒展出来，啪一声，亮出了她无与伦比的鲜黄，似乎紧随着要跟蜡梅比一比。”散文写作不是科普文章，也不是说明文，要有一定的文学品质。作者在序言中对这套书的定位是：“科普打底，人文培土。”这个定位很准确，而这两本书也做到了这一点。

《植物先生》让阅读变得有趣。首先是文字有趣。作者写作时没有端着、绷着，而是很放松，时不时自我调侃一下，从文字中能感受到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其次是书本身有趣。出版社和责任编辑把这套书做成了精美的艺术品。从纸张、装帧到插图，都极具创意，而且别致、好玩。读者除了可以欣赏美文和美图，读完还可以收藏。据介绍，第一部书研发了加入植物花、叶、皮的24款手工花草纸；第二部则用24幅手工雕版印刷的版画，来呈现24种应季而食的植物。把书做成如此精致的艺术品，让作家的文字抵达更广阔的读者，是当下我们最应该做的。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植物生命的诗学转化

□洪治纲

诗歌与散文，或许是最能贴近作者心性的文体。作者的个性、气质、视野、思维与观念，在这两类文体中往往展露无遗，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为人要直，为文要曲”的古训。读袁明华《植物先生》系列图书的感受尤为深切。作者以“植物先生”自许，这一称谓固然源于孙辈口中的“树先生”，却也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由此开启一场与草木相伴的文字奇缘。从千年古树到危岩灌木，从果蔬茎果到遍野繁花，袁明华笔耕不辍、沉醉其间，历经数载耕耘，终成多册佳作。我既羡慕他这份长久的执着，更感佩他这份深沉的热爱——让生命始终钟情于草木，并将这份情意化为可亲可感的文字。

在我看来，他笔下的植物，既非浮光掠影的观赏式书写，亦非照搬百科的科普性介绍，更非简单借物言志的比兴寄托，而是将植物心性、人文历史与生活美学熔于一炉，为读者营造出全方位、沉浸式的生态体验。如果说生态文学的核心，在于重塑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关系，维护自然作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与内在价值，那么袁明华的《植物先生》系列，无疑是对生态文学一次富有诗学意义的精神拓展。它从文本、感官、文化、伦理等多个维度，拓宽了当代生态文学的边界与可能。书中无论寻常草木、果蔬作物，还是观赏花卉，在他笔下都挣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超越了人格化隐喻的艺术范式，彰显出植物生命本有的自足与尊严。换言之，袁明华并未止步于用文字描摹植物的外在形态，而是立足理解、尊重与敬畏之心，以去中心化的平视姿态，走进每一种植物的生命世界，探寻植物与人类

绵延已久的亲密联结。这种联结，或深藏于人类历史文脉，或浸润于日常烟火人间，或熔铸于作者的生命记忆，自然流淌、浑然天成，无须刻意雕琢，更不必牵强附会。

具体而言，这种植物生命的诗学转化，首先体现为植物与作家心性的彼此映照。在袁明华笔下，选材全然发自内心，取舍皆源于生命的真切感应。他无需解释为何选此植物而非彼植物，也不必论证哪株是树王、哪朵为正植，只想强调：自己笔下的每一种植物，都是一面承载特殊镜像的他者，更是确认自我心性的重要参照。为此，作者或千里奔赴，或四方寻觅，仿佛一场场热切的赴约，让植物与自身生命形成紧密的共振关系。正是这种共振，展露了作者丰沛激越的生命情愫，也打开了他内心深处的精神密码。这里既有对海外亲人“小蛋白”的血脉牵挂，有经典文学作品深埋心底的情结，有极限探险途中的意外发现，也有江南日常饮食里的温润记忆。人与植物互为他者、彼此渗透相互映照，呈现出一种融入日常又超越世俗的诗性气息。如《植物先生》中，无论是寻觅苏童笔下的枫杨树、发现西藏林芝的桑树王，还是回望老家房前屋后的毛竹林，都在作者与草木的轻声絮语中，实现了心灵与心灵的彼此映照。

这种植物生命的诗学转化，也体现在植物与人类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之中。袁明华《植物先生》系列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线，每个节气择取一种植物，展开人与草木的对话，既展现了时序流转中植物的生长节律，也呈现了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的

经验与文化，尤其是仪式文化。植物在仪式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寄寓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祈愿：艾草与清明团子、杨梅与杨梅酒、糞坑边的马兰头、父亲亲手栽种的甘蔗林，无不折射出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仪式感。可以说，这些散文重新建构了人与植物之间“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生命纽带，也印证了草木本就深深扎根于我们生活的肌理之中。特别是《植物先生II》中的各类植物，虽是韭菜、水芹、葫芦、野葱等时令食单里的寻常之物，却串联起鲜活的味觉记忆，凝结着浓浓的家族温情与故乡眷恋。

这种植物生命的诗学转化，还体现在植物与书籍格调的相互映衬之中。袁明华《植物先生》系列的出版，着实颠覆了我们对书籍的固有认知：从纸张、油墨到装帧图案，均取材相关植物进行特制，让书籍本身自带草木的生命气息。它突破了传统书籍的物理形态，创造性地将“书”打造为一件完整的生态艺术品。通过为每一种植物定制专属纸张，《植物先生》将文字层面的“生态书写”升华为可感知的“生态呈现”，也让我们阅读植物的过程，成为可触摸、可嗅闻、可细品的全方位审美体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植物的生命总依循时节的律令，在兴衰枯荣中轮回；人的生命，亦在春夏秋冬的循环里代代更迭。袁明华《植物先生》系列，既是对植物生命的诗性转化，也是将自我生命浸润于自然诗意之中的深情告白。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创作谈

在植物文学的广阔天地中徜徉

□袁明华

懂得春分食春笋、夏至食鞭笋、冬至食冬笋，节气轮回本就是指导农事的天然指南。也正因此，我很自然地将植物书写与二十四节气结合在一起。植物依节气而生长，每一次物候变化，都能在草木身上找到印证。这天然搭建起清晰的时间框架，也赋予植物鲜活的生命节律。孩子们读来亲切易懂、富有仪式感，仿佛跟着植物一同走过四季轮回。我索性将《植物先生》，打造成一套“二十四节气植物研学课”。

节气教会我观察植物的时间秩序，而走遍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则让我看到：植物同样是人类情感的永恒载体，东西方文明在此奇妙交汇。某年春天杏花盛开之际，我走进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见到了镇馆之宝——《盛开的杏花》。这

幅特写画像是梵高晚年为庆祝弟弟提奥之子降生而创作，视角完全来自襁褓中的婴儿，仿佛孩子躺在杏花树下向上仰望。因此观赏时，最好将画面倒置于头顶，如同婴儿望向天花板，能看见光影自蓝天洒落，光点透出澄澈的天蓝色。这是梵高倾尽心血之作，发病时被迫停笔，病情稍缓便立刻继续。在他穷困潦倒的一生中，《盛开的杏花》是一曲纯净的生命赞歌，他倾注了最真挚的爱与祝福，寄予新生命无限希望。

那么，这些观察与感悟该如何落笔成文？在整个系列的创作中，我始终遵循十六字写作思路：科普打底，人文培土，地标导航，游记呈现。为实现“地标导航”，我近乎痴狂地奔赴世界各地，追寻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植物。为写好银杏、

水杉这两种中国特有珍稀植物，我先寻访“天下银杏始祖”与“水杉之王”，再花费数年时间，循着它们引种海外的轨迹，走遍全球，记录它们在世界各地的生长踪迹，足以分别绘出银杏与水杉的分布图。这种“地标导航”式写作，让知识、节气、行走、传统与情感融为一体。在我的文字里，每一株植物都不是背景或道具，而是与我平等对话的生命。当我来到德国魏玛歌德故居和博物馆，从“歌德的银杏树”上摘下一片二裂银杏叶寄给“小蛋白”时，银杏在我心中已然是世界级的生命巨人，是历经万世沧桑、永恒不朽的自然神话。

有专家老师评价我的作品，认为《植物先生》系列图书在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领域开辟了一

行走在千山万水间的书写

□陆春祥

袁明华《植物先生》系列图书，我是看着它们从无到有、如同草木一般慢慢生长起来的。一次，我们聊起写作工具，大元（袁明华）说书中的几万字都是他在手机上一字一句敲出来的。这个画面格外生动，也很“大元”。他向来如此，风风火火，却又极致认真。我常笑称，大元是“行动的巨人”，他的书房不在方寸斗室，而在千山万水之间。我想用“经验之甜”概括读这套书的感受。这个“甜”，并非甜腻，而是经过时光沉淀、脚步丈量后，蕴于文字之中的饱满、醇厚，甚至带着几分苦涩回甘的滋味。散文最忌“二手经验”：端坐书斋，翻检资料，拼凑出一篇四平八稳的文章，算不上真本事。真正的散文，贵在“一手经验”，要有现场的温度、泥土的气息，要有“我就在这里”的笃定与真切。大元的写作，正是对“一手经验”最生动的诠释。

经验之甜，甜在“自身在场”。读《植物先生》，最打动我的并非植物百科知识，而是那些近乎“危险”的亲历时刻。比如，他在金沙江边拍摄木棉花，明明有严重的恐高症，却为了一朵落花，战战兢兢走到悬崖边。最终照片拍下了，那朵一路珍藏的落花，却在他直起身的一瞬间，飘入两江交汇处归于尘土。这般描写，若非亲身经历，绝难虚构。又如在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斯坦，他追寻玄奘足迹，这不是寻常旅行，而是在时空交错中与古人对话，切身感受“天庭有绝色美景，天庭也是凶险的绝杀之地”的震撼。他将自身置于极端环境，以缺氧、寒冷与恐惧丈量历史，文字因此厚重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应如医者，触摸时代与社会的脉搏。而大元触摸世界的方式，就是用脚行走。他走过120多个国家，从南极点到青藏高原，这种行走绝非浮光掠影的打卡，而是全身心的深度浸入——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兑换笔下的文字。

经验之甜，甜在“记忆根须”。大元的文字之所以动人，还在于他有根。他的根在“李家桥”，在“螺蛳桥”，在那些已经消逝的江南乡村。看《立夏：岭上开遍映山红》，他写童年的映山红：“梦境里常常闪现春游归途中的某一个情景，小伙伴们蹦蹦跳跳下山去，人人手中挥舞着一支映山红，多多少少都摘一点。那一份永不消逝的野趣，串起儿时的天真无邪，青春的意气风发，以及老来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依托，在漫长的岁月里，演绎成一首不老的童歌。”这段文字，让我想起自己写《水边的辞修》时的那种心境。我们都曾经是乡村的孩子，那些草木、那些泥土、那些童年的游戏，是我们写作最深层的动力源。大元写植物，写到最后，写的还是人，还是那片回不去的故土。他写《父亲的甘蔗林》，那种对故乡变迁的痛心和对父辈劳作的敬意，都融进了“一根甘蔗”里。他说：“许多人说，我们没有故乡了。”但正是因为没有了，才要写，才要用文字把那个“李家桥”重新建立起来。这就是散文家的责任——用文字重建一个精神原乡。

经验之甜，甜在“时间的醇化”。大元对植物的认知，不是学科式的，而是生命式的。他写一朵花，往往要写它的前世今生，写它与人的关系，写它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比如，他写武则天与牡丹，并不仅仅是讲一个传说，而是通过考证，还原了历史上武则天对牡丹的真实热爱，进而引出“焦骨牡丹”背

后的文化意蕴。他写紫荆花，从儿时打架的记忆，一路写到闻一多，写到清华大学校花，写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上的标志。这种写法，打通了个人记忆与公共历史的壁垒，让一朵花变得厚重起来。

经验之甜，甜在“情感的纯度”。大元是个情感浓烈的人，他的文字里藏不住东西。他写外孙女“小蛋白”，写妻子“月光”，写那些在川西、青海资助的孩子们，那种疼爱、牵挂和不舍，全都赤裸裸地摊在纸上。在《清明：梨花的灵籁之境》里，他写丹巴的孩子们送别时的情景：“拥忠斯姆低着头，只是流泪，送了一程又一程，抓着我的手始终不肯放。总算劝回去了，又哭着追回来。同去的姐妹不知该怎么办，索性蹲路边呜呜大哭起来：那我们回去再住一晚吧！那一刻谁都心软了。”这种细节，如果不是真情实感，是写不出来的。写作不是作秀，而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他把这份情感带进了文字里，让植物写作有了温度，有了人心。

我始终倡导，写散文应从做学问开始。好的散文，应当是一座扎实的“博物馆”——它坚实厚重、内涵丰盈，既收藏时光，也展示时光。《植物先生》系列，正是这样一座关于植物的文字博物馆。在他的笔下，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被安放在时间的展柜之中，让我们看清草木的来龙去脉，读懂它们与人类的绵长牵绊。大元的写作，当懂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可能：散文可以走出书斋，用身体去触碰世界；可以袒露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将故乡背在身上走遍天涯。植物无言，而“植物先生”替它们发声。他说得那么真挚、那么深情、那么有力量。愿我们永远保有对世界的直接经验，让这份“经验之甜”，成为我们文字最坚实的底色与根基。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

“植物先生三部曲”的创作，前后持续了整整8年。

起初，我只是想为外孙女“小蛋白”写一本书。从她懂事起，我便常常地亲近自然，教她辨认花草树木，希望她拥有一个贴近大地、热爱万物的童年，不被各类培训班束缚天性。8年前的夏天，在呼伦贝尔一片如梦似幻的白桦林中，“小蛋白”给我取了一个英文名——在她眼里，外公认识所有的树木，于是她叫我“Mr.Tree”（树先生）。那一刻，白桦树的纹路如星辰般明亮，“小蛋白”欢跳得像林间小鹿。此后每逢“紧急情况”，她便大声呼救：“Mr.Tree!Mr.Tree!”《植物先生》的书名，也由此而来。也正是在那时，我发现身边许多人，尤其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面对漫山遍野的花草，往往叫不出名字。我们与自然的疏离与割裂，远比想象中更为严重。于是，我的私人写作，渐渐多了一份公共使命。但我依然坚持为孩子而写。三部曲的扉页，分别题献给“小蛋白”、二宝，以及天下所有孩子。孩子的天性里，本就藏着对植物与生俱来的敏感与亲近。把书献给孩子，也就等于献给一个家庭，更能带动亲子共读，让自然走进生活。

我自幼喜爱植物，熟知南瓜花何时绽放，枫杨树何时挂起“元宝”。守着屋后的一片竹园，我

条全新的写作赛道，提供了“植物文学”的写作样本。这一评价，也为我们思考相关命题打开了新的视野。借此契机，不妨先厘清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自然文学强调人对自然的观察与感悟，生态学会关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而植物文学，恰恰是二者共同的基石。倘若没有对植物本身的深切认知，所谓“热爱自然”便容易流于空洞。植物文学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感的入口——当你真正了解一株草如何破土、一朵花如何绽放，才可能真正理解自然的伟大，也才可能生发保护自然的自觉与行动。

展望未来，植物文学的天地何其广阔。城市化进程中，孩子们离土地越来越远，对植物也越来越疏远，这恰意味着植物文学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它不仅是一种文学样式，更是一种文学的回归，一种重建人与大地情感联结的方式。

我时常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多年以后，“小蛋白”也带着她的孩子走进一片白桦林。那个孩子或许同样会发现树上有许多“眼睛”，会追问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花。“小蛋白”会告诉他：“我们叫它Mr.Tree——因为很久以前，有一个爱树的人，把所有树的名字都记在了心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想，这几本书，就没有白写。（作者系《植物先生》系列图书作者）